

# 乡土印记的传递：《贾平凹散文选》中陕西方言的可译性与翻译批评

杨思敏 马庆林

西安明德理工学院，陕西西安，710124；

**摘要：**贾平凹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英译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贾平凹散文选（汉英对照）》由胡宗锋教授与罗宾博士共同翻译，是“当代文学名著英译丛书”中出版的首部作品。该译本深度承载了陕西的地域文化与精神，是推动本土叙事国际化的重要尝试。本研究旨在验证王宏印教授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在具体个案分析中的有效性，并为中国乡土文学，特别是其中方言元素的英译策略与评价，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贾平凹散文选（汉英对照）》；文学翻译批评标准；方言翻译；文化负载词

**DOI：**10.64216/3080-1516.25.09.063

## 1 《贾平凹散文选》创作背景与译本特征

贾平凹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自小在农村成长，世代务农。作为“山地的儿子”，即便久居西安，他仍始终以“乡下人”自居。这份深植于血脉的乡土情结，驱使他在创作中大量运用质朴的方言俗语。他从不避讳自己的农民身份，反而将乡村视作创作的缪斯；其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不仅屡获大奖，更深受读者喜爱。通过其深切的个人感触与笔下文字，贾平凹不仅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宏大变迁，亦表达了对乡土生活的礼赞与时代变革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农村现状与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这一切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

贾平凹的散文艺术融博学的视野、丰赡的细节与质朴的日常性于一炉，致力于从生活琐细中提炼生命的复杂本相与其附着的情感维度。其作品无论题材如何，均浸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真挚的生命体验。尤为突出的是，文中闪烁着源自个人独特体验的哲理火花，并化为一种极富情致与个性的诗性沉思。这一特质在《西安这座城》、《说棣花》、《敲门》等名篇中尤为显著。贾平凹的散文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平民主义转向。他的作品自觉地摒弃了知识的玄奥与道德的说教，转而采用一种亲历者的叙事姿态，在对日常经验的诗意转述中寄寓哲理。这一文学实践不仅彰显了他标志性的叛逆与创造精神，也从根本上确立了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人物，以及世界文学格局中中国声音的重要地位。

《贾平凹散文选（汉英对照）》由胡宗锋教授与罗

宾·吉尔班克（Robin Gilbank）博士合作翻译，作为“当代文学名著英译丛书”的开篇之作，其英译本于2019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该译本从《愿人生从容》、《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及《自在独行》等多部贾平凹散文集中精选出27篇代表作，如《西安这座城》、《陶俑》、《荒野地》与《写给母亲》等名篇。这些作品题材丰富、体式多元，集中展现了作家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译本依据散文主题，匠心独运地划分为“城”（5篇）、“物”（10篇）、“情”（4篇）与“思”（8篇）四个部分，结构明晰，行文流畅，自出版以来深受海内外读者好评，为陕西地域文化及本土精神的国际传播开辟了多元路径<sup>[1]</sup>。本研究将以王宏印教授的“六条标准”为理论框架，对该译本进行系统分析，重点考察其在处理陕西特色语言与文化负载词时的策略与成效，以期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新的实证案例。

## 2 文学翻译批评的“六条标准”

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王宏印提出了文学翻译批评的六大准则：语言要素、思想倾向、文化张力、文体对应、风格类型以及审美趣味。这些准则不仅为批评者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便于其根据具体目标与实际需求，灵活设定评价维度，从而有效推进和完成各类翻译评论与评估任务。<sup>[2]</sup>该体系主张，明确的标准是保障批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基石。它通过六个维度对译本进行全面剖析，为文学翻译批评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分析范式。

本研究即依托此标准体系展开个案分析，以验证其理论的应用价值。

### 3 基于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个案研究：《贾平凹散文选（汉英对照）》

#### 3.1 语言要素（language）

译文的语言要素是构成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第一重要的问题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要求，译文语言应是地道的文学语言，而不是生硬的或生造的人工语言。尽管语言本身具有大众化特质，且翻译的“居间”性质使得译文语言既不同于源语创作，也不同于译语原创作品，但它仍须具备文学语言的一般特征。即在符合规范用法的基础上，应富有现代生活气息、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展现出鲜明生动的个性化与风格化。

贾平凹在其散文创作中频繁运用方言与口语，尤以表现地域民俗与风土人情的篇章为甚。此类语言元素的有机融入，不仅构成了其文本鲜明的语言标识，也彰显了作者在探索契合自身审美与表达需求的叙述路径上的自觉追求与显著成效。总体而言，其散文语言呈现出质朴无华的基调，而在这份朴素之下，又蕴藏着细腻深沉的情感肌理，使读者感受到一种真切自然、平易近人的艺术魅力。陕西方言中蕴含着大量独具地域特色的词汇（如“圪蹴”、“二楞”、“一疙瘩”等），其英译实践不应仅以满足基本语义传递为旨归，而应致力于在译文中再现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与艺术魅力<sup>[3]</sup>。通过此翻译，使读者不仅能理解其字面含义，更能窥见陕西方言的话语原则，进而洞察陕西地区深厚且独特的文化底蕴。因此，如何精准传达这些方言词所内蕴的意蕴之美与质朴之美，便成为译者需要深入考量与审慎处理的核心问题。

例1：比如有些人，恓惶了几十年，终于孩子大了，又给孩子娶了媳妇。（《说棣花》）

译文：For example, there are those who spend decades feeling worried and vexed about business of raising and marrying off their children.

此例中，“恓惶”一词融合了忙碌不安、悲伤凄楚与穷困潦倒等复杂意涵，是对人之生存境况的一种生动摹状。译文用“worried and vexed”，在语义层面精准对应于原文，将人物生活境遇的窘迫与内心忧虑的复杂心情生动地传达出来。

#### 3.2 思想倾向（inclination）

保持原文的“思想倾向”，即其内在的情感基调，

是文学翻译的关键所在。然而，译者极易在过程中发生不自觉的偏离，导致原作的“低沉”被弱化为“平和”，“热烈”被强化为“热情”。这就要求译者在实践中必须保持高度自觉，精准把握并严格遵循原作的情感脉络。

例2：你若继续走，走，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和崇拜，尊你神圣。（《孤独地走向未来》）

译文：If you toil on and on, the others can no longer catch up with or surpass you. They are then compelled to worship and applaud you, exalting you as some divine being.

从思想倾向的传达来看，本例的关键在于译者对原文情感复杂性的精准识别。面对“孤独”与“坦然”并存的文本，译者深刻理解了这种孤独并非消极的孤僻，而是一种主动寻求内心安宁与精神独立的选择。译文未使用“alone”等中性词，而是选择了“toil on and on”（不懈奋斗），突出了过程的艰辛与主动性；用“compelled to worship”（不得不崇拜）和“exalting you as some divine being”（将你尊为神圣）则有力地传达出众生在巨大差距面前的敬畏与折服，从而反衬出先行者坚韧、卓绝的精神境界，这与原文“坦然”的基调高度契合，准确再现了原文的精神内核。

#### 3.3 文化张力（tension）

“文化张力”指的是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所呈现的某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源于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形成的张力。表面上看，译文与原文或许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在这表层对应之下，实则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冲突与互动。正是这种由文化差异催生的张力，构成了翻译过程中独特的审美机制，使原文与译文在对照中产生互文性的美学效果。翻译的本质是在保持原文透明性的前提下，于译入语中实现符号与文化的动态对应，而非机械直译。贾平凹笔下的方言俗语承载着深厚的地域文化，译者有责任在保证译文与原文存在必要透明性的前提下，着力展现其内在的文化张力，从而向外界传播这些独特的传统特质。

例3：我只好圪蹴上往下滑。

译文：I could only squat and ride my backside.（《我的小学》）

本例中，“圪蹴”一词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其意为“蹲”，且特指“蹲在长条凳上”这一行为。

此习俗是“陕西八大怪”之一，因其有凳不坐的反常行为而广受关注。此处的翻译难点并非字面意思的转换，而在于如何跨越文化差异，确保译文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这一独特民俗。翻译批评应介入社会对翻译价值与功能的认知，其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sup>[4]</sup>。译者将其处理为“squat”，既精准地描摹了动作状态，又以译入语读者更易接受的方式，有效地传递了原文的文化意象，达成了跨文化传播的预期效果。

例4：至今，我的胃仍然是洋芋糊汤的记忆，我的口音仍然是秦岭南坡的腔调。（《我的故乡是商洛》）

译文：Even today, my stomach still retains the memory of the cracked corn porridge with sliced potatoes. My accent remains that of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原文中的“洋芋糊汤”是典型的方言词汇，其强烈的地域性可能导致商洛以外的读者（包括国内及国外）产生理解障碍。为实现功能对等，译者舍弃了直译，转而采用解释性的意译“the cracked corn porridge with sliced potatoes”。该处理方式虽未保留方言形式，但准确传达了其核心语义，即这是一种由土豆片与碎玉米熬制的粥羹，成功地将这一地方特有食物介绍给了国际读者。

### 3.4 文体对应(gender)

“文体是为了表达或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而设计的一定语言艺术形式。这语言形式不仅是约定俗成的和民族性的，而且是具有规范性和典型性的<sup>[5]</sup>。”（王宏印, 2005:127）文体是兼具民族性、规范性与典型性的语言艺术形式。这一理论对诗歌翻译实践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它要求译者在进行英诗汉译时，需遵循汉语诗词的格律要求；而在进行汉诗英译时，则需融入英语诗歌的韵律体系（如抑扬格）。唯有主动顺应译入语的文体规范，才能使译文摆脱生硬之感，保留原作的诗学特质。

例5：凤栖常近日，鹤梦不离云。（《我的故乡是商洛》）

译文：A phoenix tower always approaches the sun,

A crane's dream always features the clouds.

译者通过工整的平行结构与和谐的韵律，再现了原文形式上的美感。其译文不仅精准，更在英语的诗学体系中重塑了琅琅上口的节奏，做到了形神兼备，体现了

高超的文体驾驭能力。

### 3.5 风格类型 (style )

风格作为个性化的产物，与作为同一性产物的文体有本质区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在翻译中，译文风格须与原文保持一致：若原作文风简约自然，译文亦当如是；若原作风格粗犷直白，译者亦需采用对应的表现手法，否则便背离了忠实于作者真实意愿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伟大作家的代表作正是特定民族风格与时代风格的集中体现。

以关中民谣为例，其作为广泛流传于陕西关中农村的口头文学，语言奔放夸张、生动形象，内容涵盖生活百态，兼具地域性、时代性、教育性与娱乐性。它不仅是关中人生活的真实记录，更是其情感、喜乐与爱憎的直接载体，完美体现了关中地区独特的民间风格。

例6：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

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

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

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西安这座城》）

译文：Loess drifts over the Qin land of eight hundred li,

Thirty million Qin folk roar out local opera,

A bowl of sticky noodles fills them with glee,

But having no pepper makes them complain.

在处理富含地域特色的关中民谣时，译者致力于在风格、内容与文化层面实现功能对等。如“一碗黏面喜气洋洋”的译文“A bowl of sticky noodles fills them with glee”，既保留了原文口语化的文体风格，准确传达了语义信息。关中民谣中，“没有辣子”是“不尽兴、不舒服”的意思，“嘟嘟囔囔”是“抱怨、发牢骚”。将“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译为“ But having no pepper makes them complain”，把陕西人喜爱吃辣子的习惯活灵活现地再现给译语读者，用口语化、生活化的译文体现民谣质朴的风格，表明译者在文体忠实与文化传真方面的自觉追求。

### 3.6 审美趣味 (taste)

翻译中的审美趣味，本质上是关注译语读者的接受问题。中西方读者在知识结构、审美心理与阅读期待上

存在系统性差异，这构成了跨文化传递的主要挑战。译者必须充分预见并化解这种审美间距，其翻译策略与审美再造的水平，直接决定了译语读者能否顺利接纳并欣赏异质文化所带来的独特美感。

例7：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译文：First-class folk, faithful ministers, filial offspring, have

Two tasks to fulfill: reading books and ploughing fields.

该英译本语言流畅，富有节奏感，且注重意境和谐的营造，为读者呈现了独特的翻译审美。这表明译者秉持着超越字面直译的理念，致力于传达原作的精神内涵与美学特质。此句原文出自贾平凹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他阐述了“读书”与“耕田”作为人生要义所象征的深刻哲理——即尽忠尽孝的责任伦理、刻苦求知的治学态度与勤勉不辍的职业精神。在婚礼这一庄严仪式中，此言既是对女儿的未来寄语，亦是对其婚姻幸福的美好祝愿，译本恰当地传递了这份凝重而深情的情感基调。

#### 4 总结

通过对《贾平凹散文选》的系统分析，本研究发现，胡/罗译本在处理陕西方言时，并非采取单一策略，而是在“六条标准”的指引下，灵活运用了语义对等、功能补偿、解释性意译等多种方法。其成功之处在于，译

者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文化张力的调解者与审美趣味的重构者。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证实了王宏印批评标准在分析乡土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与深刻洞察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地方性知识与全球化语境的碰撞中，成功的文学翻译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实现“乡土印记”的有效跨文化传递的。

#### 参考文献

- [1] 胡宗锋, (英) 罗宾·吉尔班克. 贾平凹散文选(汉英对照)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 [2] 王向远.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J].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1(02): 83-89.
- [3] 钟思远, 代银凤. 立足根性情感凝练陕西精神——贾平凹散文中的陕西民俗描写与地方文化精神述析[C] // 商洛学院, 《小说评论》编辑部, 丹凤县人民政府. 从商州到世界——第三届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陕西省丹凤县育才学校; , 2024: 315-319.
- [4] 刘云虹. 当下翻译批评应关注的几个问题[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4, 47(01): 14-16.
- [5] 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杨思敏（1997—），女，陕西富平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